

当官与发财

当今社会,机会很多,诱惑很多,漏洞很多。一个领导干部,要想以权谋私,是很容易的事;要想洁身自好,则需要时时警惕,严防死守,倒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特别是那些处在实权部门、要害岗位的干部,只要想要,几乎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。因此,领导干部必须管好自己,时时自警、自省、自戒、自律。任何教育都代替不了自我教育,任何法律纪律都代替不了自律。对干部来说,最关键的防线是自守。

当干部必须明白一个道理:想当官就别想发财,想发财就别想当官。君子生财有道,取之有方。“道”就是合理,“方”就是合法。不能利用职权,巧取豪夺,发不义之财;要见利思义,不可见利忘义。在利益面前,要想想自己该不该得,该得的未必就得,不该得的千万不能得,绝不能发不义之财。一旦你得了别人的好处,就得给人办事,就会受制于人,或许从此你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里了。

《道德经》讲:“名与身孰亲?身与货孰多?得与亡孰病?是故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,可以长久。”一名领导干部应当懂得,名声与生命、生命与财富、得到与付出的利害关系。过分地追求名利势必付出更大的代价,过多地聚敛财富势必遭到惨重的损失。只有懂得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,懂得适可而止才不至于招致失败,才能长治久安。

《礼记》讲:“敖不可长,欲不可从,志不可满,乐不可极。”一个人傲气不可滋长,欲望不可放纵,意志不可自满,快乐不可过度。名利犹如美食,谁都喜欢吃,但不能贪食,否则,一定会吃出毛病来。

干部最大的特点是有权,但这个权是公权而不是私权,必须慎用手中的权力,公权公用,公事公办。不能私事公办,公私不分,更不能以权谋私,搞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、权名交易。

一个领导干部应当“广交友,慎交友”。尽可能扩大交往面,同社会各界、三教九流、各个层面的人接触,特别要多同普通百姓接触。如果你同官员交往,谈论的多是“官本位”的话题;如果你同学者、名人接触,关注的更多是成名成家;如果你同宗教人士接触,探讨的是如何淡泊名利,超脱红尘;如果你同普通老百姓接触,最关心的莫过于就业、升学、看病、住房,如何过上好日子。只有同社会各层各面的人保持广泛接触,才能真正了解社情民意,寻找到社会公认的公共价值观,也有助于自我心理平衡。如果只同富人、名人、贵人打交道,你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倾斜,心理也会产生不平衡。“心理不平衡”这正是干部犯错误的开始。领导干部切忌拉帮结派,搞自己的小圈子,千万不要同那种心术不正、投机钻营、唯利是图的人搞在一起,否则,很容易被人利用,落入圈套,被拖下水。不要迷信那种只有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的神话,“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”,只有不做亏心事,才不怕半夜鬼敲门。

干部是安邦治国的重要人才,是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。党和国家要培养一名能镇守一地、主管一方的领导人才是很不容易的。一个干部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、取得成功,也需要日积月累,付出巨大的心血。尽管当干部挣不了大钱,但日子一般不比别人差,还有地位、权力、声誉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。因此,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,自重自爱,好自为之。如果贪图眼前利益,为一套房子、一批“外财”,断送了自己一生的美好前程,甚至弄得身败名裂,家破人亡,那是很不得得的。一个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,就如同上了秋千架,务必时时小心,千万不要放松自己,否则一松手就甩出去了,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。

现任与前任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我们的事业是长期的,而干部总是暂时的,新老交替、干部轮换是正常的事情。在干部的经历中,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现任领导与前任领导的关系问题。

在干部交替中,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第一把火,就是匆匆忙忙否定前任领导;第二把火,就是匆匆忙忙颁布新政,提出一套新目标、新口号、新政策;第三把火,就是匆匆忙忙动组织手术,搞大换班或采取“杀鸡儆猴”的办法。这“三把火”的背后是一种浮躁心理作怪,有哗众取宠之心,无实事求是之义,反映了这种干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为人的不厚道。

在外国多党制或两党制的政体下,一旦执政党更迭,原来的在野党上台,自然会搞“三把火”,否定前任,发布新政,搞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我国的政治体制同国外不同。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,党的基本路线、大政方针是连续的。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继往开来地奋斗。这就像是一场长跑接力赛,需要一棒接一棒地跑下去。等到你接棒的时候,如果你认为前一棒跑得好,那你应当再接再厉,继续领先。如果你认为前一棒跑得不理想,那就应当快马加鞭,追赶上去。只有傻瓜、笨蛋才会宣布,前几棒跑得不好,统统不算数,自己要推倒重来,从零开始。

一代胜过一代,后人超越前人是自然规律,不然事业怎么发展,社会怎么前进?因此在干部交替之后,新任领导者不能一切照旧,而应当力求有一种新气象、新局面,在思路、政策、人员安排上做一些调整是正常的。前任领导应当欢迎后任领导对自己的做法进

行必要的改进。然而,新任领导应当清醒地意识到,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工作,而不要首先在挑剔前任的毛病上花很多心思。如果说,当你不在位时靠评头论足、批评当局还能显示自己的某种高明,动员起某些群众的话,那么当你主政之后,靠批判前任并无助于提高自身的威信。指责别人不行容易,而要证明自己行并不容易。这时,群众不看你怎么说,而看你怎么做;不在你想法多,而在你有没有办法;不在你许了多少愿,而在你兑现了多少。

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。即使本事再大的人,刚到一地,在情况不明、心中无数的情况下,也很难抛出什么高明的方案。那种下车伊始,便哇啦哇啦,到处发议论、作指示的人,只会使人反感,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新官上任,切忌进入太锐、谋事太急、气焰太盛。上任之初,最要紧的是稳定人心、稳定干心、稳定局面。团结面越大越好,树敌越少越好。切忌自己的位置还没坐稳,就开始搞人事调整,以人划线,弄得人心惶惶。这样人为地树立了很多“政敌”,增加了领导的阻力,削弱了执政的基础。某些在原有秩序下不得意、不得志的人,在新官到来时往往表现得活跃,整天围着你转,说三道四。他们想通过批评前任领导的无能,歌颂现任领导的英明来讨得你的欢心,以便得到某种好处。而前任领导者器重的骨干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冷眼观察,保持沉默。新任领导这时听到的可能是倾斜的舆论和“一边倒”的声音,千万不要为这种声音所左右,凭一时的好恶而决定人事的去留。如果你能把前任任命的骨干变成自己依靠的骨干,把怀疑者变成拥护者,那是最高明的。

对上与对下

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领导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,是上情下达、下情上传的重要渠道。如何处理对上和对下的关系,这关系到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,也反映了党风、政风和干部作风的状况。

处理上和对下的关系,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,干部的水平就在于能不能找到并坚持这种一致性。这种一致性的基点就是实践,就是群众。实践是检验一切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。为群众服务,对群众负责,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。政策的好坏、干部的优劣,归根到底要看实践效果,看群众是否满意。

在任何有效的组织体系中都会实行“下级服从上级”的原则,下级应当维护上级领导的权威,保持政令的畅通。如果各自为政,各行其是,就会一盘散沙,一事无成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组织因素,就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,有一个有高度权威性的政府调控体系。

下级对上级的忠诚、负责、服从,并非只是建立在单纯的组织纪律的基础上,根本的原因在于上级领导机关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更了解全面,更顾全大局,因此下级对上级的服从,与服从真理、服从大局、服从长远利益是一致的,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盲从的基础上。对待错误的领导、错误的决定,不但不应当盲目执行,而且应当敢于抵制。正如毛主席所说:“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,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,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,是否真有道理,绝对不应盲从,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。”(《整顿党的作风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,第829页)

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,就存在官员“公忠”还是“私忠”之说。公忠,就是忠于国家,忠

于社稷,忠于百姓,而非只是就君臣个人关系而言。社稷意识应当超越君臣关系,不论君臣上下均应忠于江山社稷。只有臣忠于君,君忠于民,方能天下为公。一个真正的忠臣,应当对上尽言于主,对下致力于民,对自己修义从令。私忠,只是忠于君主个人,愚忠愚孝,绝对服从,君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的主仆关系。今天,我们对上级领导的忠诚、负责和服从,是建立在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基础上的,是公忠而非私忠。健康的组织生活,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完全依附,而是上级和下级的平等交换和相互依赖。上下级干部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,而绝非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。

我国现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,它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制度,而不是一种集权制度。民主集中制一方面体现了民主选举、少数服从多数、集体领导、会议决定、尊重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等重要民主内涵,另一方面也作出了“个人服从组织、下级服从上级、全党服从中央”等纪律规定。在解读民主集中制时,人们往往忽视了上面的民主内涵,而侧重于下面的“三个服从”。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是“民主基础上的集中”和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”,其中民主是前提,是本质,是目的。而集中是手段,是过程。如果不讲民主,只讲集中,必然导致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,助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,发生苏联斯大林时期和我国“文革”期间的悲剧;反过来,如果只讲民主,不讲集中,就会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。在实际操作中,上级机关应当侧重保证“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”,防止权力的异化和变质。下级单位应当切实注意“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”,防止各自为政。在中国这种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情下,尤其要防止个人独断专行的发生。

照抄照搬与开拓创新

对待上级指示,最流行的说法就是“原原本本地传达,不折不扣地贯彻”。其实,这并不是对待上级指示的科学态度和正确做法。一个奋发有为的干部,对待上级指示应当遵循四条基本原则:

一是吃透精神。在认真学习理解的基础上,弄清本质,掌握要领。“不唯明字句,重在得精神。”原原本本、照抄照搬是最简单不过的,只要识字,谁都会做。只有掌握了精神实质,才能解放思想,守住底线,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
二是弄清下情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摸清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,摸准群众的脉搏,了解社情民意,做到心中有数。

三是搞好结合。把理论与实际、上情与下情结合起来,找到贯彻上级指示的结合点、切入点、突破点。结合才能落实,结合才有实效。干部的领导水平就在寻找结合点上。

四是开拓创新,创造性地贯彻执行。上级政策是针对面上一般情况制定的,各地情况千差万别,实践发展千变万化,对上级指示只讲“不折不扣”是远远不够的,切不可生搬硬套搞“一刀切”,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。一个负责任的干部应当把握政策原则,守住政策底线,在贯彻执行中审时度势,该坚持的必须坚持,该变通的适当变通,该修补的适当修补,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地方,该突破的要敢于突破。

江阴市华西村是中国农村

发展的一面旗帜。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是真正的农民英雄,他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。吴仁宝在总结基层工作经验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,他说:华西村是一个村级单位,上面至少有五级领导——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镇。各级领导都对华西村做过不少指示,都应当贯彻执行。可是各级领导的要求未必一致,全部执行就很难办。上级精神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中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上面强调“一大二公,以粮为纲”,多种经营、私营个体砍得越光越好。到80年代推行包产到户,似乎集体的东西都分掉才对。现在,苏南地区又在推行“三集中”,即耕地向规模农业集中,农户向居民区集中,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。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,盲目地赶潮流,事事都想当排头兵,政策一调整就被动了,也不可能有华西村今天的局面。

吴仁宝感慨地说:千难万难,一切从实际出发,做到实事求是,是最难啊!

相信群众,依靠基层,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,这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,是我们的事业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。

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根本经验,就是务必把基层干部改革创新积极性发挥好、保护好、引导好;务必把广大群众劳动创业的积



干部选择

(接上期)

当前,诚信缺乏是我国社会风气中一个突出的问题,假政绩、假新闻、假文凭、假广告、假名牌、假账目、假药、假奶等现象屡见不鲜,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、道德风尚和政府形象。要改变这种风气,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,从党和政府做起,首先打造一个诚信政府。一个诚信政府,应当言必信,行必果,说老实话,办老实事,不虚报政绩,不掩盖问题,不粉饰太平,不说大话空话,不订不切实际的指标,不乱开空头支票,不朝令夕改,不做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事情。在党内,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勇于发扬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的作风,营造一种“说真话、说实话、说心里话”的良好氛围。一个人说真话可能会吃亏上当,但不能因吃过亏上过当就去说假话,变成一个虚伪的人。越是高层领导,越要带头讲真话,敢于听真话,引导别人说真话,以真换真,以诚换诚。讲真话不是随心所欲,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重要的是反映真实情况,反映老百姓的心声。你可能不喜欢直言快语、敢说真话的人,但应当坚持“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”的原则,千万不能排斥打击那些敢讲真话、敢报实情的忠贞之士。一个领导者的身边,不能只有“和口”,没有“魏征”;只有一群“喜鹊”,没有几只“乌鸦”。如果你身边都是一帮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、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的势利之徒,那就离垮台不远了。